

ZHONGYANG CAIJINGDAXUE
BOSHI YANJIUSHENG
XILIE JIANGZUO

中央财经大学
博士研究生
系列讲座 第一辑

▶ 中央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系列讲座编委会 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本书受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共建项目专项资助

中央财经大学 博士研究生系列讲座

第一辑

中央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系列讲座编委会 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央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系列讲座·第一辑/中央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系列讲座编委会编·一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5

ISBN 978 - 7 - 5095 - 2813 - 6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经济学 - 文集 IV. ①F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7310 号

责任编辑：刘五书

责任校对：杨瑞琦

封面设计：郁 佳

版式设计：汤广才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

URL: <http://www.cfepl.cn>

E-mail: cfepl @ cfepl.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100142

发行处电话：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64033436

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787 × 960 毫米 16 开 20.5 印张 331 000 字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2011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42.00 元

ISBN 978 - 7 - 5095 - 2813 - 6/F · 2384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本社质量投诉电话：010 - 88190744

目 录

| | |
|--------------------------------|-------------|
| 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财政思潮 | 姜维壮 (1) |
| 新的范式，新的思维，新的挑战 | |
| —21 世纪财政学发展展望 | 李俊生 (12) |
| 世界性税制改革相关理论评析与加强中国税收法制 | |
| 建设 | 汤贡亮 (35) |
| 中外市场经济体制比较 | 王巾英 (56) |
| 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中国经济总体发展进程的影响 | |
| 及对策 | 齐 兰 (88) |
| 经济学为什么和怎样研究制度？ | |
| —制度经济学研究对象、目的、一般理论框架和 | |
| 有待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 | 黄少安 (110) |
| “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与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 | 邹东涛 (123) |
| 中国古代金融的特点 | |
| —兼及中西文化比较 | 姚 遂 (141) |
| 《国富论》与经济发展 | 张碧琼 (169) |
| 我国经济周期、政策周期与股市周期的互动关系研究 | 贺 强 (188) |
| 政府预算改革：提升施政能力的最佳切入点 | 王雍君 (211) |
| 公共财政框架与制度创新 | 马海涛 (230) |
| 国内外收入分配测度方法评述 | 刘 扬 (263) |
| 对经济效益问题的若干思考 | 侯荣华 (283) |
| 深层次矛盾的理论分析 | |
| —中国经济运行基本格局的初步探讨 | 闻 潜 (316) |

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财政思潮

姜维壮^①

一、研究的必要性、指导思想和学习方法

研究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财政思潮是当前的社会形势和国家方针政策提出的要求：当前我国正在实施改革开放方针和致力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的政策要求是立足于本国国情，认真研究和学习借鉴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理论、政策、管理方法。西方国家在长期市场经济实践中积累起来的许多经验、教训，对我们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方面我们近些年已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与借鉴，其中也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政策问题，就是在研究借鉴的实践中不能不注意到西方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其基本任务是为完善和卫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思想意识服务的。而我国正在努力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相结合，即它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有利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因此，在研究和借鉴西方财政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的实践中，就必须按照我国宪法的规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重点是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立场观点和方法，全面理解邓小平“三个面向”方针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渊源，力求通过学习，对西方的财经思想和方针政策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认识，达到洋为中用的目的。这是十分必要的。

① 姜维壮，男，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学习方法：运用提出问题，讲述要点，指定书目，引导自学的方法，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的有关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进行有重点和有选择的对比分析与参考借鉴。

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在财政问题上的基本观点

根据恩格斯的结论，马克思平生在理论上又有两个最重要的发现：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剩余价值）。这也是我们研究财政问题的两个最基本的理论依据。

关于这两大发现的主要内容和历史意义，恩格斯在 1883 年 3 月 17 日所作的《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这篇著作中作了概括性的论述。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被发现的重要意义，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的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①

关于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原理，马克思在他的许多著作中都作过繁简不同的论述，其中在 1859 年 1 月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对这一理论的探索和发现过程以及这一观点的基本内容和运用情况，作了较完整的论述：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 18 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

^①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版，第 57 页。

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意识。^①

在“导言”中，主要是辩证地论述了社会再生产运行过程各要素（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说明各环节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和相互之间的依存关系，从中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生产的对立规定上的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那是自明之理。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之间的一般关系。当然，生产就其片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②

关于同财政有密切关系的分配与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克思的论述是：“照最浅薄的理解，分配表现为产品的分配，因此它仿佛离开生产很远，对生产是独立的。但是，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上述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如果在考察生产时把包含在其中的这种分配撇开，生产显然是一个空洞的抽象；反过来说，有了这种本来构成生产的一个要素的分配，产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确定了。”^③

关于剩余价值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恩格斯于《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也作了极高的评价。他指出：“马克思还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85页。结合学习参考书目5、6。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9页。

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以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列宁曾把剩余价值学说称之为“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① 关于剩余价值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包括财政分配）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曾做出如下的分析和概括：“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而分割剩余价值，则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剥削阶级和非劳动者收入的真正源泉。”^②

上述理论被运用于对国家和财政某些范畴的产生及其社会性质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者对国家的性质及其与财政的关系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有代表性的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中，在科学分析国家社会属性的同时，也明确指出国家财政的一些主要范畴也正是适应国家这种公共权力进行活动的需要而出现的。具体表现在：“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实现’，‘理性的形象和实现’。勿宁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又无力摆脱这种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就从社会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产生了一些现代的财政范畴。这主要是“为了维护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捐税是以前的氏族社会完全没有的。但是现在我们却十分熟悉它了。随着文明的向前发展，甚至捐税也不够了；国家就发行期票，借债，即发行公债。”关于国家和财政的阶级属性，主要表现在：“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44页。

^② 《资本论》第1卷第23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参看参考文献10，第三章第二节“四剩余价值分配”。

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①

三、马克思主义的财政观点及其对我们提出的要求

从上述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论述中可以将马克思主义的财政思想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是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强调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意识。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作为运用财政主体的上层建筑的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而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内部矛盾发展的产物。而且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而且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从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这些科学原理给我们提出的要求是：研究财政问题，首先需要树立起科学的国家观。

(二) 要树立科学的分配观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再生产原理，财政作为社会再生产运行过程中分配环节的特种构成部分，其性质、形式、规模，以及与各环节之间的相互关系，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的生产方式决定的。这表明，财政和一般分配一样，决不是一个与生产无关的孤立的范畴。因此，对财政问题的研究以及对其本质属性和运行规律的探讨，就不能离开社会再生产和生产方式去片面地孤立地强调自身的特殊性和独立性。

(三) 要树立科学的财政观

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社会再生产理论，对社会制度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九、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第167、第168页。

起决定作用的，归根到底不是分配环节及其特种构成部分的财政。社会的历史发展实践证明，财政政策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固然能对社会的发展发挥一定的甚至是相对决定性的作用，但从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看，对社会发展起根本性决定作用的归根到底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生产方式，而财政范畴最多只能在一些次要方面改变以既定的生产为基础的分配关系，却丝毫动摇不了这种关系的基础。

四、与马克思主义鲜明对立的一些西方财政理论

（一）分配独立论

在西方的财政理论中，与马克思主义形成鲜明对立的，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论点是分配独立论。这种理论的突出特点，是强调分配的独立性和特殊性，并将其视为改造现存社会的关键因素。具有代表性的如：19世纪初期的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代表人物萨伊，就在其政治经济学著作中创立了所谓“三分法”，即把政治经济学体系分为生产、分配、消费三个相互独立的部分，这不仅割裂了经济过程各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根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抹杀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历史上各种社会生产方式之间的本质区别。嗣后，19世纪中期英国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詹姆士·穆勒，用“四分法”划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把分配作为与生产无直接关系的独立范畴进行研究。他的儿子约翰·穆勒，进一步深化了“四分法”的体系，并提出两种不同性质的规律论，即财富生产规律和分配规律，并断言“财富生产规律和条件含有‘自然真理’的性质。在这种规律和条件方面是没有任意选择或可以武断的余地的”；而在分配领域，则断言“分配规律是统治着社会的那部分人的意见和情感所制造出来的，并且在各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家里是大不相同的。”^① 在19世纪70年代，拉萨尔、杜林等人是宣扬这一唯心史观生产、分配关系论的典型人物。拉萨尔在工人运动中，主张运动的目标是通过分配把“全部劳动所得给予工人”，把“全部企业赢利在工人中进行分配”，认为只要改变分配方式，使工人“公平地”分配到

^① 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1848年英文版。

“全部劳动所得”，就可以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并把累进所得税说成是国家的经济基础。杜林则把分配作为“第二过程”，把生产作为“第一过程”，认为两者毫不相干。按他的划分，生产属于自然和物质领域，决定于劳动，而分配属于道德和法的领域，取决于暴力和人们的意志行为。并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的生产很好，应继续存在；应改变的只是以暴力为基础的分配制度，据此他还设想出“经济公社”组织，在其中实行分配上的“普遍公平原则。”

马克思针对在生产和分配关系问题上的这些形而上学观点，在一系列著作中作了深刻的批判和科学的论述。主要的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对主张分配与生产分离的观点作了全面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提出科学的结论是：“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分配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的结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形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决定参与分配的形式。”^① 针对拉萨尔的唯心主义分配理论，马克思专门写了《哥达纲领批判》一书（1875年），指出这种论点的要害是“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并指出“把所谓分配看成是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因为事实是“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② 恩格斯在剖析杜林的分配理论实质时，得出如下的结论：“杜林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几乎没有提出任何指责，他要保持旧的分工的一切基本方面。”因为“据杜林先生的意见，分配是和生产根本没有联系的，在他看来，分配不是生产决定的，而是由纯粹的意志行为决定的。”并指出：按照杜林的这种分配理论建立起来的经济公社，只能表明“他要现存的社会，但不要它的弊端。”其实质是“他想以幻想的结果来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98页。

^②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页。

消灭价值规律的现实结果。”^①

这种在理论上和政策上孤立地只谈分配不谈联系生产、只谈分配方式不谈生产方式、只谈财税政策不谈生产关系的现象，在现代的西方经济学著作中以及财政改革的实践中，还有相当的普遍性。马克思曾把这种改革称之为“财政戏法”。而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这些理论和政策思想带来的也只能是短暂的矛盾缓和和理论不断变换更替的后果。

（二）财政决定论

这种思潮的核心思想，是在国家、社会与财政的相互关系上，片面夸大财政的决定性作用，把资本主义国家财政的某些范畴说成是国家和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与骨骼。在 19 世纪 50 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发表了专题批判艾米尔·德·日拉丹的文章。日拉丹在其著作《社会主义和捐税》的小册子中，断言“税收几乎是我们社会赖以存在的唯一基础”，并从中得出结论：“我们都竭力到九霄云外去寻找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最重要的改革就在税收里。我们一找就会找到。”日拉丹还把国家预算说成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杠杆”，而把“推动世界转动的支点”说成是普选权，认为普选权对预算的影响也就是对税收的影响，结论是“取消选举特权就必然会取消财政上的一切不平等现象。”^② 流行于 20 世纪初的财政社会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断言，只有预算才是“国家的骨骼”，并得出结论：不管任何时代，对国家和社会发展起决定作用的，都摆脱不了财政政策。并断言阶级斗争最早的形式就是赋税斗争；人类最大的“精神运动”的原因，也离不开财政政策。据此断言，如果财政学忽视这些史实，就不成其为应用科学。而按他们的设想，所谓财政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把社会经济秩序完整地反映到财政上，以实现最大的社会效益^③。

马克思对上述财政理论的实质进行了深刻地剖析，得出的结论是：“税收改革是一切激进资产者的拿手好戏，是一切资产阶级改革的特殊要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三编社会主义“四、分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37、第 338、第 35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评艾米尔·德·日拉丹“社会主义和捐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384 页。

^③ 姜维壮：《当代财政学主要论点》第三篇第 14 章第 7 节，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7 年版。

素。从第一批中世纪的城市小资产者起至当代的英国自由贸易论者止，全部斗争都是围绕着捐税进行的。”而这种改革和斗争的实质是：“捐税最多只能在一些次要方面改变以资产阶级生产为基础的分配关系，如工资和利润的关系、利润和利息的关系、地租和利润的关系，但它丝毫动摇不了这些关系的基础。关于捐税的一切争论和探讨都是预先肯定这些资产阶级的关系是万世长存的。”“减轻捐税，更公平地分配捐税等等，这是庸俗无益的资产阶级的改革。”^① 针对把税收说成是“社会存在的唯一基础”，预算是“国家的骨骼”等唯心主义思潮，马克思指出，这类思潮的要害是混淆了国家社会与政府机器经济基础的本质区别，并明确指出“赋税是政府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② 而以赋税充当社会的唯一基础，以预算充当国家的骨骼，只能是把财政范畴混同于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把实行资产阶级的财政改革看成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基本目标，起到美化和保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作用。

不容忽视的是，在当代西方的一些有相当影响的财经理论著作中，把财政政策说成是决定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因素的思潮，尚有相当的代表性。有的把政府实行的收入再分配称之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安全阀”和“内在稳定因素”，甚至作出“当前不要财政政策就等于死亡”的结论^③。

至于西方国家税制改革的真正政策目标，仅以进入 21 世纪以来美国布什政府的减税政策为例，就最具典型性。根据国际金融报的报道，布什减税方案中仅红利税率降低一项的好处，就有 64% 的部分将成为纳税人中 5% 最富有者的额外收入^④。

（三）还有在国家实质问题上的唯心主义思想

由于国家与财政之间的特殊关系，在国家实质问题上的分歧，也必然导致在财政实质问题上的不同认识。在西方国家观的发展史上，影响比较

^① 马克思恩格斯：《评艾米尔·德·日拉丹“社会主义和捐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384 页。

^②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22 页。

^③ [美]阿·图·埃克斯坦：《公共财政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68、第 26 页。[美]萨缪尔森：《经济学》上册，商务印书馆 1979 年版，第 215 页。

^④ 见《中国财经报》，2003 年 1 月 7 日。

深远的是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论亦称“民约论”，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的“智者派”中思想激进的学者（代表人物是伊壁鸠鲁）就提出，国家和法是人们相互之间自觉缔结的契约产物的论点。这是国家社会契约说的萌芽。在17—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扩大，一些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学派和思想家开始广泛宣传社会契约论，主要有古典自然法学派和启蒙思想家的霍布斯、卢梭、格劳秀斯、洛克、狄德罗等。如英国的霍布斯在1651年出版的关于国家制度学说的著作《利维坦》中，以利维坦（巨人或巨灵）象征君主立宪制政体的国家。认为人生唯一的目的是卫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寻求自身最大的快乐和幸福，但在自然状态下“人对人如狼一般”，这个目的难以达到，因此人们感到必须通过协议，缔结契约，组成国家。作者认为君主立宪制是最好的政体，人们对君主应绝对服从，这样君主才能执行他的权力，维持社会“秩序”，使个人的利益不受侵犯。法国18世纪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等著作中，从人的天赋自由平等观点出发，认为人类社会的不平等不是从来就有的，政治上的不平等是随着私有财产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封建专制制度使这种不平等达到顶点。结论是用革命暴力推翻封建暴政是完全合理的。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国家是人民通过协议、订立契约而产生的，因而国家是代表人民的普遍意志的。在国家中人民并没有失去自由，而得到了“约定的”自由。

在国家属性问题上，宣扬这类唯心主义思潮的还有许多，具有代表性的如社会有机体论、守夜人论、暴力决定论等。当前较流行的有强制共同体论、市场失灵论、个人合作组织论等。从长期的历史实践看，这类唯心主义国家观的共同特点是：不仅难以据以说明人类社会和国家发展的历史规律，也无法说明和解决西方国家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表现出的种种严重弊端。甚至连他们自己也有人被迫承认“马克思从阶级利益的角度考察社会各阶级的冲突就很有道理。”但又用“特殊利益集团”取代了阶级的概念，并指责马克思“错误地赋予简单劳动一资本两分法独有的重要性。”^① 也有人将资本主义国家行为中暴露出的种种严重弊端归结为“政府的失灵”，并将其根源归结为特殊利益集团对政权的控制和政府公务员

^① 布坎南、穆斯格雷夫：《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观》，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的人性自私。对此提出的解救办法是实行投票的“一致同意原则。”这连他们自己也认为这是难以实现的幻想。^①

当然，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中有关财政的内容，还是西方财政思潮中与马克思主义鲜明对立的观点，都远不只是这些。这里仅是结合专业学习，选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做了简要的整理和分析，供作研究分析问题时参考。

主要参考文献

1. 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九、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 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三编社会主义“四、分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4. 姜维壮：《当代财政学主要论点》第三篇，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
5. 列宁：“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6.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7. 马克思恩格斯：“评艾米尔·德·日拉丹‘社会主义和捐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8.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9.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关于财政财务的论述（第一篇，重点第三章第二节，四、剩余价值分配），中央财政金融学院财经研究所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10. 布坎南、穆斯格雷夫：《公共财政与公共选择——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观》，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0年版。

^① 布坎南：《民主财政论》，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24—125页。

新的范式 新的思维 新的挑战

——21世纪财政学发展展望

李俊生^①

一、序言

“标准”的财政学一般以“市场失灵”理论作为其理论基石。由于存在市场失灵问题，导致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导致了公共部门的存在和发展以便“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然而，这个在当代几乎放之国内外所有的大学课程中皆准的财政学“标准”理论，在自20世纪末期以来却不断遭遇各种挑战，这种挑战既来自于以“新公共管理运动”为代表的新公共管理财政实践，也来自于学术界对“市场失灵”理论的反思与批判。

一方面，在财政实践方面，从20世纪末期开始，各种在“标准”财政理论看来完全属于非财政领域事物的市场化管理方式、市场化商品生产方式和市场化商品供给方式被引入了政府财政领域以及政府与公共部门当中，从而形成了不同于“传统”财政范式的新的财政与公共管理范式（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 David Osborne, Ted Gaebler, 1993）；另一方面，在财政理论与财政思想的研究上，财政学者与经济学者们开始反思

^① 李俊生，男，经济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教授，财政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几乎被奉为现代财政理论基石^①的“市场失灵”理论，有些学者甚至根本就不认为有什么“市场失灵问题的存在”^②，这些林林种种思辨形成了新的财政学思维。毫无疑问，作为严肃的财政学者，我们不可能对这些现象不闻不问，熟视无睹。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讨论自 20 世纪末期以来开始逐步形成的、或者仍处在变革过程中的财政理论与实践问题，作为对 21 世纪财政学发展的一种展望，同时也试图总结归纳在 21 世纪剩余的 90 年的时间里，财政学正在面临的新的挑战和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在这里，作者使用了“标准”财政学一词，这是借用了西方财政学者的用语，西方经济学者使用“标准”财政学理论中的“标准”(STANDARD)一词的含义是通用的意思，或者说是广为学术界接受的理论的意思，其含义有点类似于我国学者使用的“主流”财政学理论的意思。

二、国际化背景下的研究领域拓展

从财政学说史的角度看，财政学的研究对象从财政学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是非常明确了，即以政府的财政活动及其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作为研究对象。但是就财政学研究实际涉及的领域而言，则呈现出不断拓宽的趋势——迄今为止，这种趋势大体上经历了如下这样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即早期的财政学主要侧重于对政府筹资问题尤其是对税收问题的研究，如 17 世纪中期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威廉·配第；第二个阶段，则注重财政学理论框架的建设，如 19 世纪 80—90 年代的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瓦格纳和斯坦因 (Wagner and Stein) 着重研究了政府的作用及其作为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者与市场的区别 (Rechard A Musgrave, 2008)；第三个阶段，主要是从 20 世纪初期开始，财政学致力于

^① 这里借用了马克思在其经济学巨著《资本论》中的一个用语。马克思把“劳动价值理论”作为其“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石，因为马克思建立的“剩余价值理论”就是以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的。现代西方财政学实际上也是建立在“市场失灵”的理论基础上的，甚至连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布坎南也不否认这一点。

^② 例如，加拿大学者 Glenn Woiceshyn 就认为所谓的“市场失灵根本就不存在，他举例说，如果某些人因为造成严重的水或者空气污染进而对他人造成严重损害的话，那只是说明政府没有成功地保护好个人的权利，因而是政府失灵，而不是市场失灵。参见 Glenn Woiceshyn “Market Failure” Doesn’t Exist, *Capitalism Magazine*, Jun. 21, 2006。